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

——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

王国乡 著

*The Moral Bounds of
Individual Rights:
Solving the Ethical Dilemmas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敬畏自然
呼唤良知
为己修德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

——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

王国乡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 / 王国乡著. ——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10

ISBN 978-7-5100-2941-7

I. ①自… II. ①王… III. ①道德-案例-分析-中国 IV. ①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8800 号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

著 者：王国乡	筹划出版：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吴兴元
责任编辑：云 逸	营销推广：ONEBOOK	装帧制造：墨白空间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张跃明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 邮编 102612)		
开 本：690×960 毫米 1/16		
印 张：28 插页 4		
字 数：400 千		
版 次：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投稿邮箱：onebook@263.net		
编辑咨询：133-6631-2326		
营销咨询：133-6657-3072 010-8161-6534		
ISBN 978-7-5100-2941-7/C·133		定 价：42.00 元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123226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王国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退休教师。193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曾任新华社记者。1982年入郑州大学任教，主讲西方经济学与国际金融理论。1987年调入北京筹建人民银行创办的中国金融学院，任国际金融系主任、国际金融学与西方经济学教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退休。退休后，该学院并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与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后至退休前，共发表金融与经济学论文63篇，出版专著与编著12部。著述获奖十多种，其中省部级奖三项。

本书通过两个典型案例分析，揭示当代中国人在道德实践和道德理念中存在的诸多困惑；并通过对四种著名高校伦理学教材的一系列质疑，指出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困惑，起因于改革决策程序上，只重视经济基础上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方式向市场方式的制度性转轨，而忽视对意识形态中的传统道德观（伦理观或价值观）进行相应的更新或变革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在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把中国古典伦理学中由孔子最早提出的“推己及人”的伦理方法和斯密的“同情心”分析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微积分数学分析）方法相结合，尝试建立一种与国际接轨并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思想体系。

本书根据现代经济学的需求理论证明：

“人性自利”是“人必须满足需要才能存活，才能幸福”的同义语。

人性自利，并非万恶之源，而是众善之端，是道德产生、社会形成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道德是人们自觉选择的与人为善、合作互利、患难相助的和谐生活方式。

自利是道德之母——个人是为了过幸福生活而自觉修养善待他人的道德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幸福，也让他人幸福”，就是良心，就是道德。

良心是道德产生的根源。良心就是孔子的“仁者爱人”之心，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康德的“善良意志”。

爱人不是利人，而是尊重或不损害他人自利的权利。

市场经济道德的本质不是无私利人，而是自利不损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市场行为就是人类的道德生活（非战争生活）的写照。

按双方协商同意的价格交换，就是经济人在厉行自利不损人的道德。

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它损害别人的利益。

损己利人（无私利人）是双重的不道德：既损害自己的利益，又导致他人损人利己，对己对人都不道德。

每个爱占便宜的人，都希望他人是“活雷锋”。

一个“活雷锋”多的地方，肯定是损人利己者的天堂。

一个主张“无私利人”道德观的人，肯定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

大多数主张利己主义的学者，都提倡为己爱人、为己互利（即自利不损人）的道德。

道德的目的是自利，“不损人”是实现自利的手段。因为只有不损人的人，才会被社会或他人所接纳，实现为己互利的目的。

所有公职人员的服务都是有偿服务，不是无私利人。

军警、卫士、公务员因公损职，可歌可泣，堪称职业道德楷模，但不是无私利人的行为。

“患难相救”是一种人道精神，目的在于救助他人的生命，并非为了奉献利益或牺牲自己的生命。

慈善事业是先富人群为了回报社会、完善自己人格或企业信誉的人格道德行为。

慈善事业的宗旨是救助失去自主生存能力的人。

慈善的道德界限是救助他人自主生存能力，而不致使他人成为损人利己者。

慈善公理：救命不救穷，助残不助懒，助学不助贫，助能不助逸。

本书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等边际原理”证明：

“边际效益递减律”与“经济人理性自利”，以及据以推导的“等边际原理”是经济伦理学中的三大基本定理，勘与牛顿力学“三大定理”媲美。

“边际效益均等”是资源最优配置——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同步达极大值的标志。

只有人人追求最大利益，才能形成市场价格机制，调节资源最优配置，实现富民强国的目的。

社会制度正义的标准是无损一人地增进社会利益。

个人追求不损人的最大利益是制度正义实现的必要条件。

计划经济剥夺个人为己（自利）的自主权利，导致市场衰败，民不聊生。

市场经济保障个人为己的自主权利，促进市场兴旺，民富国强。

中国市场化改革之所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在于承认每个人参与市场交换，实现为己互利的自主权利。

经济人自利的自主权利是通过自己的自主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权利。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是无损他人的自主权利。

计划经济实行统购统销，剥夺个人自主选择权利，就是把人当作动物来饲养。

承认个人在经济上的自主权利就是承认现代文明社会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

平等就是人人都具有相同的自主权利。

自由就是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不损害他人自主权利的事的自主权利。

民主就是每个人都有维护个人自主权利的话语权与参政议政权。

既承认个人自利的自主权利，又提倡“无私利人”道德，是导致中国人道德困惑、进退失据、改革止步的根本原因。

放弃无私利人的计划经济道德观，树立自利不损人的市场经济道德观，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

国家依法保障公民自利的自主权利不受侵犯，是建设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和谐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治本之策。

继承与发扬光大以孔子的“忠恕之道”为代表、以民众的“良心”为本源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重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家园的必由之路。

序 一

1997 年我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这本书经过两次大改动,出了第三版,销量突破十万册。有些地方政府和大专院校拿此书作为思想工作的重要参考书。殊不知这本书的写作是由于王国乡的开导,我才从事道德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在 1985 年前后,中国准备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和传统计划经济的道德非常不同。我感到需要对此做一番研究。不解决这个问题,市场经济的推行必将遭遇极大的困难。但是我困惑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讲自利的理性经济人之上的,而道德是反自利的。这二者如何能统一起来。难道市场经济就不需要讲道德吗?

我认识王国乡最早是在 1982 年全国第一次数量经济学年会上。以后我们经常交流经济学方面的心得,但我并不知道他对伦理学有研究。在 80 年代中偶然和他谈起我对两种经济制度下的伦理标准的困惑时,他对我说,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其实是讲利益的,市场经济也讲利益,二者并不矛盾。这一句话开导了我,从此我开始了伦理学的功利主义的研究。这个结果就是《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后来我又知道,王国乡还对美学有研究和心得。他确实是一位难得的极具创造性的学者,融会贯通许多社会科学。要不是他在北大当学生时被打成“右派”,从此被耽误了二十多年,做了二十多年的苦力,他这一辈子会有重大的成果出现。

现在这本书就是他从金融学院的国际金融系主任职位上退休后写的一本讲伦理学的专著,透彻地分析了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关系。他论证了道德原则如何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对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其中关键的突破点就是王国乡和我先后发现的择优分配原理。所以由我来介绍他的理论是很合适的,固然我们两人在观点上也有细微的区别。

经济学研究财富如何创造。它的答案极为简单: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

财富的创造。由于交换是平等自由的,它必定同时有利于双方。既然双方都有利,就说明有财富的创造。如果没有财富创造,像赌博那样,一方得利另一方必定受损,损益之和为零。这就是零和游戏。交换不是零和游戏,它是有财富创造的。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双方都是追求利益的,而且交换是平等自由的。前者就是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定。

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自由?简单讲,平等就是没有特权。在人际关系中我所能做的事和你所能做的事是一样的。大家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在权利上的约束条件相同。如果社会关系中有了平等,就必定有自由。平等是自由的基础。不自由是因为有特权的人妨碍了你的自由。当大家都没有特权的时候,自由就自然来到了。所以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这样就会妨碍别人的自由。只有被赋予特权的人才能为所欲为。自由恰恰是约束自己,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时候,每个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认识平等和自由的关键点在于不仅仅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同时也从别人的立场,从全社会的立场看问题。

平等也是人际关系中唯一能够构成稳定社会的一种关系。如果不平等,就有在上在下之分。谁也不愿意永远处人篱下,社会就有造反革命发生。这也是人类几千年历史所证明了的。一直到人权被确立,特权被取消,人类社会才找到了长治久安的道路。现在世界上特权盛行的地方也是政治最不稳定的地方,社会稳定的国家都是消灭了特权的国家。平等的必要性并不是感觉出来的,也不仅仅是经验的总结,而是一个逻辑推导的结果。没有特权的社會必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因为在人际关系上已经没有改进的余地。

理性经济人是引起争论的一个概念。这是说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上的,交换创造财富也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上的。它引起的争论是市场经济将是一个冷冰冰的各人追求自利、缺乏同情心的社会,甚至会发生损人利己的事情。事实上市场经济并非如此。经济人的假定也要从全社会的立场看问题。经济人不是特权人,而是普通人。他既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想到别人也是经济人,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经济人追求利益的限度是不损人。我们常常埋怨市场经济中的丑恶现象,认为都是自利造成的。其实,绝大多数的丑恶是损人,而非利己。这二

者有严格的区分,可是我们往往把它忽视了。

计划经济要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无私奉献”。市场经济不把“私”看成那么坏,相反,“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力量。“私”的界限是别人的“私”,私心不许可损人。牺牲自己为别人对不对?这要看双方的地位是否对等。如果是同样的人,就没有必要牺牲自己为一个同样的别人。但是如果不是对等的人,比如青年人对老年人,落水的人和在岸上的人,牺牲一点自己为别人着想是应该的。反之,如果是同样的人,为什么是我为你牺牲,而不是你为我牺牲?计划经济还误以为人人都为别人牺牲,大家为大家,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不用金钱,没有货币,不需要讨价还价。但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社会没有价格,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必将导致一个没有效率的社会。这个道理已经为许多事实所证明。计划经济国家的失败,纷纷转轨到市场经济,就是事实的证明。王国乡的书中进一步用逻辑证明了这一点。这里就要用到“择优分配原理”。

交换可以生产出财富。市场经济国家是靠更多的交换致富的,不是靠更多的劳动致富的。那么何以交换生财?交换以前和交换以后,物没有变,财富是怎样增加的呢?答案是因为“物尽其用”。同样的香蕉在广州的用场没有在北京的用场大。香蕉还是那个香蕉,但是把它交换到北京它就“尽其用”了。劳动把“物”生产出来,交换使其“尽其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财富看成是包含在物之内的东西。物不变,财富也不会变。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物没有变,所以交换不产生财富。于是有“等价交换”之说。可是如果交换不创造财富,人们为什么要交换?这个简单的逻辑被忽略了,造成理论的严重错误。不过马克思只是继承了前人的错误,自古以来都是认为只有劳动创造财富,而交换赚钱只是剥削。所以历来都是限制商人,鼓励农民。人类的进步被这一错误理论极大地延误了。

交换既然能够生产财富,又能使双方得利,为什么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中出现得如此之晚呢?这是因为社会关系中缺少平等自由,因为人权得不到保护。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从来都是一个等级社会,有特权,没有人权。交换虽然不断在发生着,又不断被破坏。它形不成制度。在特权社会中,人的生命得不到保护,财产更没有保障。交换就不可能形成制度。只

是18世纪以后人权开始在西欧被确立,人与人才慢慢有了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这是市场经济得以巩固的根本原因,至今仍然如此。人权比较得到尊重的国家能够维持较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人权被漠视的国家市场则很难发展起来。这在我国也得到了体现。在改革开放以前,人权被极端地漠视,根本没有任何市场存在的余地。改革以后,人权有了初步保障,市场慢慢地得到发展。但是进一步的市场制度的巩固还得靠人权的进一步的巩固,靠司法的公正,政府不能随意干预所有权,百姓有自己的合约权。

英国哲学家边沁说得好,道德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这句话有深刻的含义。道德不是少数人的幸福,更直截了当地说,道德不是特权者的幸福。因为这里的少数人绝不会是平民百姓,只有特权者才会有特殊的幸福。所以道德是反对只照顾特权者的幸福的。当每个人的幸福或利益都同样重要时,在市场上就会出现公平竞争。当买卖双方都遵从公平竞争的规则时,将出现均衡价格。均衡价格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所以道德和经济学有了联系。

当供求双方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买方希望价格越低越好,他寻求索价最低的供给方;卖方则希望价格越高越好,他寻求出价最高的需求方。对于大宗商品,如粮食、石油、黄金等,供求双方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在一个拍卖和招标同时起作用的信息透明的市场上,必将出现均衡价格。在经济学上就是供应线 and 需求线的交点。在这个市场上卖方不可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因为有别的卖方在竞争;买方也不可能买到价格更低的商品,因为有别的买方愿意出均衡价来买。这个均衡状态又是供需的数量相等的时候,没有供不应求,也没有供过于求。既不会买不着,也不会卖不掉。因为当数量上不均衡时,价格将发生变动。供不应求时会涨价;供过于求时会落价。因此在自由市场上价格是均衡的,供求也是均衡的。

王国乡和我在70年代先后推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这个原理解释了何以均衡价格是最优的。拿化肥的分配为例,全中国有几亿块土地,如何分配化肥给每一块地,使增产的粮食为极大。办法很简单,制定一个标准,要求每公斤化肥增产的粮食不得低于某个量。比如说,每公斤化肥至少要能增产两公斤粮食。实施的办法是让农民拿两公斤粮食换一公斤化肥,或拿两公斤粮

食的钱买一公斤化肥。这就是说,增产效果最差的化肥其增产量也不会低于两公斤粮食。这就是择优分配的等边际定理。

大家都知道木桶原理,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进一步讨论,最节约木板的水桶要求每块板对盛水的边际贡献相等,也就是板的长度应该一样。如果有一块板特别短,加长一点就能够增加盛水量,它的边际贡献比其他木板的边际贡献大。这就不是最优分配。在分配化肥的例子中,如何确定最低的边际贡献?这只能靠试验。设定一个两公斤的标准,如果供不应求,说明标准定低了。提高一点再试试看,一直到所定的标准恰好使化肥的需求等于库存的化肥量。这里隐含的原则是每个农民都有同样的购买资格。谁也没有特权,或者说: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择优分配原理的道德基础,平等导致资源的最佳利用。

说到底,道德就是不违反事理常规。不允许损人利己,不允许高人一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市场经济同样是不违反事理常规。借钱要还,说话算数,没有欺骗,老实做买卖。这样的经济恰好是效率最高的经济。经济学达到这个地步,就跟哲学、伦理学差不多了。它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我认为这就是王国乡的这本书所希望传达的道理。

茅于軾

2010年7月5日

序 二

国乡老友今年夏天让我品读他的这部慎思明辨的著作，希望我提出修订意见，并叮嘱我作一篇序言。

我告诉他，深奥的经济学和伦理学于我来说是门外汉，鄙人决无资格改易文字和撰写序文，再说在名家茅于軾先生的序言之后再写些什么，必定是狗尾续貂。

国乡答道：茅先生是从行家的角度写，请你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写，二者并行不悖。

我素来敬佩国乡的为人和学问，他的吩咐与期盼，我岂能推卸，因此只能从命，在此谬发妄言，诸乞鉴宥。

我敢担保，本书是国乡一生最精粹的著述，也是他在长达 60 年的漫长岁月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伦理思想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与个人生活的影响，进行长期观察与思考，所达到的一种深刻而系统的理论思维的结晶。

它虽然是一部寻常的学术著作，渊源于作者焦心苦虑的构思；然而，它又不是一部常见的学术著作。它的一大半来自苍茫大地，是千百万饥饿农民和劳苦大众的呻吟，另一半则来自炼狱者深沉的问难与呐喊，是雕肝琢肾的章句。

为了领悟本书的含义，我建议，读者不妨先从阅读“后记”开始，然后再读正文。

这是因为，当下的青年人很难理解，王国乡为了笃信一条无可争辩的经济学定律——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竟被戴上“极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牢狱之灾，由此挨上了二十多年伤心惨目的生活。幸好“四人帮”垮台，他赶上了胡耀邦的开放改革时代，从而摆脱政治贱民的身份，渐

渐恢复学人和思想者的角色,终于可以重新探索他所心醉神迷的经济学、美学和伦理学原理了。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下,国乡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展现。他一连发表数以百万字计的科研论文和学术著作,在学界脱颖而出,自成一家风骨。他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入手,进一步研究择优分配原理和等边际伦理原则,并对计划经济的道德观发起挑战,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伦理与道德伦理思想。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一书,则凝聚了他对于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和市场经济道德建设问题的独特看法,有不少原创性的思想火花,进而从深层次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道德前景(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进行理论探索。

私见以为,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道德伦理问题有所关注、有所思考、有所困惑、有所研究的人不妨读它一读,哪怕翻读若干章节也罢。我的愿望是,以国乡这部书为契机,业界能展开广泛的讨论,对什么是中国人的自主权利的道德边界问题大体上达成一个共识。我相信,国乡的见解,是迂论还是邪说,是持平之正论还是无稽之谬论,“历史老人”迟早会给出一个公道的结论。

作为本书的初始读者和非专业工作者,我以为,国乡提出的以下五个方面何妨予以更多关注与思考:

(1) 计划经济道德观与市场经济道德观的本质区别何在?

作者通过两个案例分析和 23 个伦理学质疑阐明,计划经济道德观的基本原则是主张个人应当对他人、对社会、对集体无私奉献自己的劳动成果或经济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市场经济道德观的基本原则,则应当是在尊重他人自主权利的前提下,维护个人的自主权利与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两个平等的自主权利人之间,一个人奉行无私利人的道德原则,向对方奉献自己的财物,必导致对方损人利己,因而,这两个人都是不道德的。因此,在人与人之间,只有实行“自利不损人”的道德原则,才有利于实现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博爱、公正、自主、和谐的生活方式。而所谓“自利不损人”的道德就是肯定个人实现自主权利,应当以不损

害他人的自主权利为道德边界。

(2)在市场经济中是否存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

作者指出,计划经济道德观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冲突”的理念之上的。而作者采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市场均衡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有利于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实现等边际原则),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最大利益,不仅不会造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反而是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这就从经济学理论上,驳倒了“无私利人”的计划经济道德观的理论基础,确立了“自利不损人”的市场经济道德观的理论根据。

(3)社会制度正义与个人自主权利关系是什么?

作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证明,市场经济制度正义的标准应当是“无损一人地增进社会利益”,而实现社会制度正义的必要条件是每个公民都必须厉行“无损一人地增进个人利益”——自利不损人——的社会责任。在这里,“自利不损人”,不仅是公民的自主权利,而且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因为只有在每个公民都具有追求“不损人的利益最大化”的自主权利的条件下,他才有可能根据利润最大化目标,把他所支配的资源(包括自己的劳动)投入到最有效的用途中去,从而,在均衡价格调节下,实现生产要素最佳组合和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社会利益极大化)。因此,保障公民的自主权利就不仅是实现社会利益极大化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实现社会制度正义的必要条件和标志。

作者指出,公民自主权利,在经济基础上,表现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在上层建筑中,也就是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每个公民都具有平等、自由、民主的权利。在这里,平等就是人人都具有相同的自主权利;自由就是人人都具有做不损害他人自主权利的事的自主权利;民主就是人人都具有表达维护个人自主权利的说话权利,以及相应的出版、新闻传播和参政议政的权利。因此,平等、自由、民主就成为市场经济制度正义实现的必要条件和标志。

(4)自利不损人原则作为制度规范与作为个体道德标准有何区别?

这是古今中外所有伦理学者都不曾考虑过的问题。作者认为,混淆二者的区别是导致伦理学陷入逻辑混乱,从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二者是有本质差别的。自利不损人作为制度规范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人人必须厉行,违者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其作为道德规范则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人自觉选择的和谐生活方式。作者指出,早在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之前(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之前),人们之间就已经产生了简单的商品(原始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当两个原始人不是通过相互抢掠,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实现某种劳务合作或商品(物物)交换时,就已经产生了自利不损人的道德。所以,道德是具有理智且追求和谐生活方式的人们,通过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而产生的良心感悟,是对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实现和谐生存目的而做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种通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价值选择而形成个体道德的伦理方法,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之方”,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方法。所以,道德的本质就是良心感悟或良心发现。

(5)为什么要划分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二者有何区别与联系?

这同样是古今中外伦理学者未曾思考过的问题。作者认为,当今中西方伦理学语言的差异在于:大多数西方人(如霍布斯、康德和斯密)只承认人们在非经济交易关系中所表现的人格品德或爱人、尊重人的美德是道德,而不承认人们在经济关系中利己或利人的行为是道德。中国人相反,只承认经济关系中存在经济道德(有“无私利人”、“为己利人”、“单纯利己”、“自利不损人”之分),而不承认在非经济关系中存在一种独立于经济道德的人格道德(认为人格道德是经济道德在人们心中的内化)。这是导致中西方文化互不理解,甚至产生重大误解的原因。因此,作者将“自利不损人”的道德区分为经济道德与人格道德。经济道德是个人为了用和谐方式取得财物来满足自己需要,而自觉选择的通过互利合作或互利交换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方式。作者称其为“为己互利”的道德。人格道德是个人为了融入社会,最终取得经济利益,而自觉修养的健全个人人格品德或美德的行为方式,作者称其“为己爱人”的道德。二者的关系是,人格道德是经济道德的人格保障;经济道德是人格道德在经济行为中的实现方式。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孔子

《论语》和斯密《道德情操论》的解读,证明这两位伦理学巨匠,都在确认“人格道德”存在的同时,也承认经济道德的存在。

在围绕上述五个方面的论述中,作者还有很多精辟的论述,留待读者去发现。

此外,本书还有两个更精彩的部分值得一提。

第一个精彩部分是作者在第六、七两章中,用通俗的语言(非高等数学语言)和浅显的数表与图像,阐述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边际理论(等边际原理)。这是众多欠缺高等数学知识,而又渴望学懂宏微观经济学原理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阅读的部分。通过阅读,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也许一天或几个小时),就可以理解边际分析方法的数学含义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并用来分析现实中的市场经济问题。

本书第二个精彩部分,就是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后记”。国乡在这一部分中,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制度变迁、伦理规范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与劳苦大众生存条件的实际影响,来说明本书表达的经济与伦理思想形成的根据和形成过程。这有利于读者从生动的事实分析中理解正文部分阐述的抽象内容。特别是在1957年之后,作者因坚持独立思考、说实话,被打成“极右分子”。在长期劳役、监禁、饥饿、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苦难生活中,在没有书籍,没有资料,既不懂高等数学,又不知边际分析为何物的条件下(作者入北大时学新闻专业),仍坚持独立思考,仅凭在大学中所学基本知识的记忆,根据一条被苏俄教条划为禁区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来分析“大跃进”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居然在思想封闭的环境中重新“发现”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理念——等边际原理,并据以推导出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一系列最优原则。这些研究成果,既为作者在出狱后,立即投入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研究活动,并登上大学经济系讲坛,积累了必要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也构成了本书写作的主要内容。

毫无疑义,“后记”是一则自撰的励志故事,对于身处逆境和绝境的人们,具有巨大的感染力。王国乡的故事,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近代苦难史的缩影,也是当年55万中国敢说实话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真实记录。读来,令人心酸,令人扼腕叹息!人们也为在残酷的思想禁锢条件下,中国仍然有这样

的为追求真理而矢志不渝的知识分子,而感到欣慰,受到鼓舞。

古人云:“还丹一粒,转铁为金,至理一言,转凡为圣。”国乡的生活和事业在 1978 年前后发生了出人意表的变化,这一方面同他赶上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好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本人的因素。国乡有两大优势:一是他的顽强意志与刻苦好学;二是他有一位贤内助,不断鼓励他战胜逆境。

国乡出生于一个小手工业家庭,一直没有受过多大委曲,殊不知进了北大竟当上了“极右派”,后来又二次蒙受欲加之罪,但他决不屈服。甚至在劳改农场就业期间还借探亲的机会向朱光潜、宗白华和李泽厚等大家请教。他的学问主要是靠自学、潜心思考与独立研究得来的。当他还是北大新闻系三年级学生的时候,就撰写了一篇人口问题的论文,并得到了马寅初校长的青睐。他受冤屈改正后连当个小学代课老师的资格都没有。北大直到 1987 年才补发他一张毕业文凭。他是不靠文凭而靠真才实学被新华总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从基层调进首都来的。

国乡的老伴魏华琪女士,原本是部队文工团演员,13 岁参军,转业后就读师范学校,成为中学音乐教师。在与国乡谈恋爱期间,因受国乡划为“右派”株连而失去工作。直等到国乡结束劳教之后,两人才得以完婚。“文革”期间国乡因写文章再次入狱,她背着孩子奔波千里,两次代国乡进京上访,坚韧不拔地帮助国乡讨还公道。这对苦命夫妻,一个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一个是忠贞不渝的女子。香港凤凰卫视去年以《苦恋——六十年婚恋往事》为题的 DVD 纪录片中还专门描述了他们盛衰荣辱的家庭故事。这一对正直朴实的河南夫妻,终于苦尽甘来,桑榆之年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国乡为笃信一条经济学定律而蒙难的故事,使我联想起中外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追求真理而牺牲的往事。人类为阐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真理也有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需要科学的思维。它们,尤其是社会科学,不得不直面窳败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狰狞的意识形态。社会科学与神学、玄学更加格格不入,是二者的对立面。“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底线。意识形态不属于社会科学,因为它的极终目标不在于科学。而不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要经得起实践